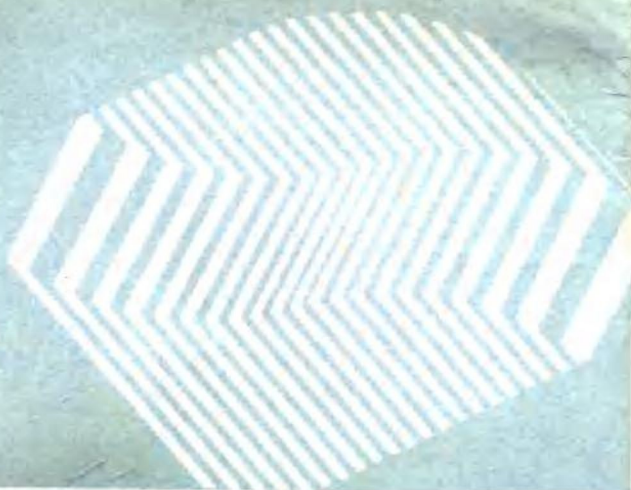


ZHUISI
FUCHA
ZHANWANG



追思·俯察·展望

——景戎华论文集

ZHUISI
FUCHA
ZHANWANG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 5 号

追思·俯察·展望

——景戎华论文集

景戎华 著

责任编辑：张希玉

封面设计：冯春兰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区九站街1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2.75·字数 298 千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

ISBN 7-5316-1760-9/N·3 定价：5.70 元

自序

欧阳公有云：晋无文章，惟陶彭泽《归去来》一篇而已；苏东坡有云：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于此余下一转语可乎？当代无文章，惟改革开放民族复兴为时代文章主题也。

时代者何？改革开放之大潮也。其势汹涌澎湃，波澜壮阔，排山倒海，横无际涯。

本世纪余下的九年和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头十年，它将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代，我们的国家将步入一个经济、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一个初步现代化的东方强国将屹立在东方。为此，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一项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呼唤、再造21世纪中华民族的魂魄，并以此激发国人投身于复兴我们伟大的国家的现代化壮丽事业之中。所以，我们的一切学术、一切艺术活动，都不能不面对这个现实性极强的时代主题。

中国的现代化自发动以来，应当说运作是成功的。同任何世界上已经步入现代化社会的民族一样，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搞不好就要出麻烦。非如此不能使我们告别贫困，达到小康，臻于富强，进入天堂。为了减少麻烦和震痛，我们必须睁开眼睛观察一下，审视一下那些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是如何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的。假如在我们认真进行了这番观察

与审视以后，我们会不难发现，中国虽然几千年以来一直以“温柔敦厚之邦”饮誉世界，但步入现代社会以后，其激进的反传统意识在世界诸国度中是极为罕见的。这一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一认识不廓清，将始终对现代化构成威胁。

所谓激进的反传统，在“文化热”中又被称之为“整体反传统”，即“全盘西化”。其方法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欧洲中心论。其理论特征是尽力贬损中国文明、中国文化。认为只有用“蔚蓝色”的西方文化，“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中华民族才可能重新获得发展的生机。他们盲目地当然也是错误地将自己比附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认为不彻底消灭中国传统文化，便不能使中国步入现代社会。事实上，“五·四”提出的这一过激理论，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评估，“文革”中又得到了膨胀性的发展，通过教科书、报纸、电台早已深入青少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多少年来人民已经习惯于这一思维方式——“造反有理”。造反就能推动历史进步。

当这些理论作为新方法、新观点传播的时候，很少有人对它们提出质疑，一时竟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实际上这些观点在西方早已是非常陈旧的理论，甚至在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经过时，已经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

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不相溶的观点，在“文化热”中当做新理论抄来抄去的时候，新潮学者们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是在拾西方学者，具体地说美国学者的牙秽。近四十年，美国的文化学者、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五、六十年代，大率为第一个阶段。其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水火不相容的。保住传统势必会放弃现代化，要进行现代化，必须舍弃文化传统。勒文森持此说最

力，他断言，中国社会只有在外部的打击下，才能苏醒，而只有西方才能进行这一打击。这一理论的基础，便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封闭说。勒文森反复强调中国社会从公元前三世纪秦一统开始，直至十九世纪，一直处于“极为稳定和平衡的状态中”，数千年间毫无变化。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为第二个阶段。代表人物为费正清、赖肖尔等。在七十年代后期，他们对自己早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若干修正，他们认为不能说中国社会始终是一个封闭的毫无变化的僵化社会。“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刻苦勤劳、忍辱负重的品格，而且是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但是十四世纪中叶以后一直到20世纪初，却停滞了。他们把它称之为“传统内的变化”，是一种量变的变化，而不是发生现代化飞跃的变革，欲实行这种变革，必须彻底打碎它的文化传统，能够实行这种打碎的唯一力量只有来自外部——西方。他的学生芮玛丽以及费维恺等人也都持如是说。

七、八十年代为第三阶段。美国的学者对中国文化、中国国情、中国社会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施拉姆提出由于中国文化具有历史传统和政治传统这样两个根本特征，这对中国现代化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帕金斯说：“一旦在影响经济发展的其它实际障碍排除之后，中国社会的若干重要特征，就远不是消极的障碍，而将成为充满活力的积极力量”。用西方文化整体转换中国文化的说法，虽然在七、八十年代，从本质上说还没有放弃，但已经明显地淡化了。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新潮学者的“西化论”是多么蹩脚，他们的“新发现”，既没有美国学者系统，时间也落后了大约至少三十年。令人惊异的是，美国学者已经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而我们的一些学者还食洋不化。

这种情绪化的“整体反传统”思想，并不仅仅是纯外在的文化心理诱导，我想至少有“五、四”以来七十年的发展踪迹可寻。

中华民族原本是一个十分和谐、安谧、稳定、友善的民族，长久以来追求天人的合一、人际的合一，并形成一套自己独特的东方文化、东方的人生哲学，在众多研究中国古史和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中，汤因比的体认是比较深入的。他说：

“中国是一个和谐而宁谧的人文世界，有高明的人生乐趣，有深刻的生命情操，也有弥漫的尘世乐趣。虽也有一治一乱的循环，与反复扰攘的战争，然而却摇撼不了中国人文世界内在的和谐性。”

很不幸的是 1840 年以后，这种和谐性在西方列强的鸦片和坚船利炮打击下被打破了，从此这个美丽安静的国家多次被卷入历史的劫难。“五、四”以前，因劫难的频繁与持久，中国人民始终面临的是救亡图存的紧迫的历史任务，还无暇思索失败的原因。“五、四”运动以后，痛定思痛，在历经了诸多政治的、军事的、科学技术的救亡实践，譬如金田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百日维新、洋务运动以后仍不见有好转的希望，一些激切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始把失败的根源归咎于中国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浸润培育下的民族性格。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经历了 1991 年的世界剧变，我认为我们初步可以平和地讨论这一问题了，并大体上形成共识。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消灭传统，特别是优秀的传统，反而是传统的升华。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何以现代化、后现代化国家的人们对自身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如此珍视，如此如醉如痴。

足堪欣慰的是，在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上，我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一点读者朋友在我的文章中不难做出自己的判

断。

由于我受中国文化浸润较深，因此对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诸多领域的爱好相当广泛。书法、篆刻、国画等等一拿起来，便很难放下，所以文集中也收入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假若条件允许，以后我很想在中国艺术史、中国艺术理论、中国美学方面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

吾友尝言：学问是“东抓西抓抓出来的”。此语颇合吾心。然而，有的时候学问也是逼出来的，报刊向你约稿，论辩要你回答等等，只好埋头硬干。林业史以及文化学方面的研究，皆由逼而成。

明人归有光说：“士固乐于有所为。若夫旷世独立，仰以追思千载以前，俯以察未来之后世，其亦慨也夫！”

诚哉斯言！

余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果能臻于此境，其乐何如。仅此自励，爰是为序。

景戎华

1992年4月6日

目 录

自序

中国文化史研究

中国文化的三次高潮及其原因	(3)
论传统	(16)
中国传统文化封闭说驳论	(24)
中国文化“封闭说”的方法论的几点批评	(33)
忧患意识与中国文化传统	(44)
中国历史上的空想论及其特征	(59)
“关东文化”的历史基因	(63)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的辩证思考	(71)
周代“五刑”考	(84)

明 史 研 究

朱元璋的右文政策及其对明代政局的影响	(93)
宣德年间的吏治改革	(98)
宣德年间的经济恢复	(107)

明代弘治年间的北部边防	(114)
明孝宗散论	(127)
严嵩现象论纲	(145)

中国林业史研究

上古森林考	(151)
先秦的植树及其保护	(165)
秦汉的森林采伐与破坏	(173)
汉代的森林及其开发	(187)
汉代林学知识的拓展	(202)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森林变迁	(207)
明清滥伐森林对生态的破坏	(219)

文学与艺术研究

《九歌》考索二题	(237)
中国书法艺术的源流与流派简论	(243)
中国美术史述略	(252)

当代史学批评

现代史学的反省与展望	(273)
评近年来的宋史研究	(287)
评蔡美彪著《中国通史》第七册（元史卷）	(295)
评南炳文、汤纲著《明史》	(298)
通向现代化的启示录	(301)
《学习与探索》创刊十周年寄语	(304)

中国哲学史讲演录

引言	(309)
一、三代的神学与《周易》	(309)
二、春秋战国的子学	(319)
三、两汉的经学	(333)
四、魏晋的玄学	(342)
五、隋唐的佛学	(352)
六、宋明的理学	(365)
七、明清的实学	(378)
八、清代的朴学	(389)

中国文化史研究

中国文化的三次高潮及其原因

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的考察，我们发现，迄今为止，实际上只出现过三次高潮：1.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2.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3.本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

一

与三次文化高潮密切关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巨大社会形态的变革：1.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变革；2.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变革；3.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

这样看来，除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革是因为外力的作用——西方殖民帝国采取特殊的鸦片加大炮的侵略方式完成的，变革前夕没有出现文化高潮以外，其它两次变革的前夕均出现了文化高潮现象。为了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我们不得不稍微涉及一下关于对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的看法。这是因为历史上的文化观念的变革往往显示社会制度的变革，而社会形态的变迁实际上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心态的变迁。

究竟应以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作为历史发展进程中诸阶段划分的界标呢？列宁认为，应当选择“那些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历史

事件”^①（着重号为笔者所加）。郭沫若同志把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的“绝对年代”界定在公元前475年的论断，随着文化史研究的深入，现在看来，越来越难以成立了。这是因为：

1. 这个年代不具备上述列宁强调的特征。

2. 如以是年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不独与《资治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抵牾，“五霸缺一，七雄少三”^②，而且也腰斩了春秋、战国这两个历史范畴。

3. 这一划分方法严重地忽视了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这个最根本的特征，而这一特征恰恰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兴奋点。准此，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上限绝对年代，还是应该界定在公元前221年。这个年代不但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飞跃，走向了空前的大一统，“特别突出，引人注目”，而且秦王朝的典章制度也奠定了后来所有封建王朝典章制度的基础。就封建制内在规定性而言，秦王朝在中国史局上的“鸿沟”特征（邓之诚语）和“法典化”^③的意义也至为明显。

4. 如果我们依据郭老的分期说来研究中国文化史，将无法解说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这一中国古史上至为罕见的文化繁荣现象。

黑格尔在谈到哲学发生的特点时，曾强调指出：做为文化核心内容的哲学并不与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而俱来，却恰恰发生在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没落的时候。他举例论证：“当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城邦没落时，伊奥尼亚的哲学反而随之兴起。”“在雅典，由于雅典民众生活的败坏，哲学兴盛的时期反而到来。在罗马，哲学之开始传播，乃在原来的罗马生活和共和国没落，罗马皇帝专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4页。

② 金景芳：《古史论集》第53页。

③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第57页。

制统治之时——在这段社会灾难严重政治生活没落时期内，传统宗教生活摇动，一切解体，而向往于新的生活。亚历山大里亚的新柏拉图派哲学家对于希腊古典哲学之高度辉煌的发挥，是与罗马帝国的没落——这样伟大、富庶、光荣，但灵魂已死的罗马帝国的没落——密切联系着的。^① 卡尔·雅斯贝尔斯更直接地提出：“最伟大的精神作品就是过渡时期的精神作品，亦即处在时代的交替时期的作品。”^② 用黑氏和贝氏的理论反观中国古史，我们恰恰感到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旧王朝解体的时代，一个过渡时代，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代文明——周礼没落的时代，时代向往着大帝国出现，历史呼唤着强人出台。新王朝终于出现了，这便是秦帝国；历史强人也终于出现了，这便是秦始皇嬴政。

问题很清楚，不管持什么封建说都不能不承认，春秋战国时期所孕育出来的诸子文化是中国的母体文化，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精神作品”，而且也是全人类的“最伟大的精神作品”。如果该时期不是处在“时代的交替时期”，那么该如何解说“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呢？不仅郭老的古史分期意见，就是范老、翦老的古史分期意见，看来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二

罗素曾云：“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③ 但是，如果考虑到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实行封建专制制度的古代中国）的政体不同，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高潮之谜尤其难以解说。从奴隶社会到半封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4～55页。

②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46页。

③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24页。

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一直推行着所谓东方专制制度——一种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压抑个性，没有民主的极端专制政体。而在希腊情况则迥然不同，文化发展有着深厚的民主意识予以滋养。“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是我国古代从来不知道的东西”^①。从思想自身来说，狭义的文化活动往往是“自由思想的活动”，“惟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②不管东西方的社会结构多么不同，黑格尔这一著名论点，即文化的勃兴必以思想自由为条件，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繁荣共同遵循的途径。以是观之，古代中国，甚至是晚近的中国都太缺乏这一素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禁锢得近乎僵化的社会，这株古老的枯藤却培育了辉煌的先秦诸子文化、两宋文化、“五四”新文化这些花团锦簇的东方文明。这实在是一个饶有兴味而又难以阐释的问题。

在我们回首欧洲而又不能求得答案之后，我们只有将我们的理性深入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层结构里去。如果我们可以把中国古史上演进的王朝系列表示为一组环环相扣的链条，我们会发现，这组链条并非十分紧密，其中有“薄弱的环节”，更有断裂或脱节之处。在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前夜，往往就是发生脱节的时候。这是一个方生方死的时刻，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其时社会激荡，天下大乱，各个阶级、阶层、流派的优秀分子都可以自由地登上历史的这个大舞台，表现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阶层、流派的意志。这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价值结构空前突变的时代。专制大厦的骤然坍塌和强大的政治控制力量的崩解，使旧统治阶级变得奄奄一息，再无力进行统治；新统治阶级乳臭未干，还没

①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第10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0页。

有能力施展铁腕。新旧斗争常常表现为一种共居状态。社会每日每时都积聚着大量的问题要求人们做出回答，因此它为文化人创造了展现才华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① 春秋战国时期和“五四”运动的前前后后，都处于这种历史的非常时刻，前者形成了辉煌的子学。先是由孔子创立了师生这样一种新型的文化传播关系，从而打破了商周以来的“学在官府”的局面。继起诸子，各执一说，一时色彩纷呈，文化成果若灿烂星河，美不胜收。后者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形成各种流派的作家群。在他们的笔下或汹涌着时代变革的风雷；或透露着新世纪的稀微曙光；或直观展现旧社会行将崩解的飘零；或感时光之不永，做才子佳人的咏叹调。这两次文化新潮的出现，实质上都是社会制度变革前夜必然出现的文化奇观。

最近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邹谠教授在分析“五四”运动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基础时，提出了一个相当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政治控制社会的力量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而社会的自发力量非常大，这就给知识分子——作为民间社会最重要的成份——的产生创造机会，因而显得异常活跃。”^② 的确如此，如果不是“政治控制社会的力量已经降到最低点”，中国的知识分子（士人）是很难活跃起来的。邹氏似应再补充一句，这一认识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甚至可以视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繁荣的一般规律。

正是时代的脱节为春秋战国的诸子、“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进行“自由思想”的机会。正是历史的过渡时期造就了伟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

② 《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载《读书》1986年第9期。